



普希金与历史研究

时间: 2006-12-25 14:18:10 来源: 俄罗斯研究中心 阅读569次

——兼谈《普加乔夫暴动始末》

李玉君[1]

【内 容 摘 要】:

普希金不仅是伟大的诗人,著名的作家,同时还是杰出的历史学家,1834年他出版了历史研究著作——《普加乔夫暴动始末》。促使他在文学创作的同时开展历史研究的主要原因,是他对祖国的热爱和责任感,是他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从该书可以看出,普希金反对普加乔夫起义,主张对起义采取严厉的镇压政策,但同时他也给予了普加乔夫以一定的肯定评价。

【关 键 词】: 普希金 历史研究 普加乔夫暴动

普希金不仅是伟大的诗人,著名的作家,同时还是杰出的历史学家,1834年他出版了一部历史研究著作——《普加乔夫暴动始末》。出于对普希金作品和思想的关注,笔者将他的这部著作翻译为中文(该书已由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有几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心:《普加乔夫暴动始末》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是怎样想到要研究历史、写一部关于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著作的?身为贵族又对沙皇专制统治持批判立场的普希金怎样看待普加乔夫起义?下面就这几个问题,谈一谈个人的一些认识。

—

关于普希金写作《普加乔夫暴动始末》的背景,苏联以及其他的国家都有学者进行过探讨。苏联史学家是从法国七月革命影响的角度来认识的^①,法国著名传记作家特罗亚则认为完全是出于偶然的因素^②。笔者认为,从大的方面来讲,普希金主要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责任感,以及出于对本国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从具体的方面讲,结婚后的普希金在经济上十分困难,他需要靠更多的写作来维持家庭生活的开支。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热爱、珍视祖国历史的强烈感情和责任意识推动普希金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进行历史研究。普希金生活的时代是俄罗斯敞开国门大力向西方学习的时期,从18世纪起,西方文化就开始大量涌入俄国,到19世纪,西方文化已经影响到了俄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建筑设计完全模仿西方,贵族的生活方式以追随西方为时髦,法语、德语成为上层社会的流行语言,18世纪时甚至连俄国科学院俄国史的研究也由德国人垄断。在汹涌的西方文化浪潮面前,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进步知识界加强对本国史的研究。一些学者、科学家积极投身于俄国历史研究,如俄国著名科学家罗蒙诺索夫(1711-1765)完成了《古代俄罗斯史》、《俄国简明编年史》的写作;大作家卡拉姆辛(1766-1826)出版了12卷本的《俄罗斯国家史》,连沙皇也关心本国史研究,《俄罗斯国家史》

就是在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下历时二十六年完成的。诗人普希金继承了前辈的这一传统。普希金是在西方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非常喜欢西方文化，但他更对祖国历史和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他永远不会因为喜欢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而舍弃俄罗斯历史” [1] (299页)。普希金在皇村中学读书时便以俄国历史为题材进行了文学创作，在南方流放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俄国历史，成为精通俄国历史的诗人。1827年，针对卡拉姆辛的历史巨著《俄罗斯国家史》，普希金评论说：作者在“谈到伊戈尔、斯维雅托斯拉夫时，怎么竟写得如此枯燥无味。这是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啊。我一定要写一部彼得大帝史……” [2] (198-199页)。普希金不仅自己想要研究历史，后来还“不止一次地劝说有才华的俄国人写回忆录” [3] (492页)，建议人们写历史“一定要描写当代的事件，以便人们能引证我们的话” [2] (199页)，因为俄国现代史是“压根儿还没有开垦过”的一个领域，“除了我们俄国人，谁也无法从事这一工作！” [4] (58页)对祖国历史的热爱和责任感使普希金走上研究历史的道路。在完成了《普加乔夫暴动始末》后，普希金在《前言》中就写到：“这一页载有叶卡捷琳娜、鲁缅采夫、帕宁兄弟、苏沃洛夫、比比科夫、米赫利松、伏尔泰和杰尔扎温等人姓名的历史不应被湮没而不为后人所知。” [5] (1-2页)。

“英雄史观”是普希金历史观的基本出发点。普希金对历史的认识深受卡拉姆辛思想的影响，认为历史是由伟大人物创造的，伟大人物的生活经历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同时，普希金对历史的研究也深受他的文学创作活动的影响，对人性、人的本质的思考与对人的美好、善良品质的追求也影响了他对历史的研究。因此，普希金非常关注“俄罗斯历史上破坏性的巨变”的事件 [1] (293页)和“具有坚强性格、高尚激情和事业心的人” [3] (427页)。普希金把俄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斯杰潘·拉辛、普加乔夫和彼得一世相提并论，同视为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普希金认为彼得一世是具有“历史的创造精神”的沙皇，他“用独断专行的手”在俄国传播了文明，扭转了历史的乾坤，使祖国之舟“乘风破浪，飞速前进” [6] (312、390页)，认为斯杰潘·拉辛和普加乔夫这些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充满了向往自由、平等的豪情和勇敢精神，他们领导进行了反抗专制压迫的斗争。普希金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斯杰潘·拉辛和普加乔夫发生了兴趣，在南方流放期间，曾让其弟邮寄关于两人的有关资料，并曾为拉辛写过诗句，还称拉辛是“俄罗斯历史上唯一富有诗意的人物” [7] (293页)。普希金为自己的历史研究确定的任务就是为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撰写专题著作。

思想的成熟、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心使浪漫诗人普希金把目光转向历史，从20年代后期起普希金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和思考。1824年11月，普希金阅读了刚出版的卡拉姆辛的两卷《俄罗斯国家史》，惊奇地发现历史和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愈加激发了他对研究历史的兴趣。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起义的参加者——普希金昔日的好朋友、俄罗斯最优秀的青年，或被杀，或被流放，普希金在愤怒、痛苦和失望中成熟起来，他比以往更加多地思考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普希金寄希望于沙皇，希望尼古拉一世能像历史上的彼得大帝那样，顺应历史潮流，为俄国建功立业，但他后来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准尉的东西，而彼得大帝式的东西却不多” [8] (166页)。普希金思考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1825年写了历史剧《波里斯·戈都诺夫》，1832年写了小说《杜布罗夫斯基》。普希金思考最多的是俄国的贵族和贵族与人民的关系问题，1826年写了《论国民教育》，1830年写了《论贵族》等文章。普希金继承了俄国古老贵族的传统观念，认为贵族应该是劳动人民的保护者，应该和劳动人民和睦相处，普希金对已经没落的世袭贵族给予很高的历史评价，而对势力强大的新贵族则抱以鄙视的态度，普希金希望“贵族中间会出现农奴的解放者” [3] (379页)。在此期间，普希金听到了一个关于18世纪俄国的贵族军官什万维奇投身到普加乔夫起义军方面全力效忠普加乔夫的真实故事，它引起了普希金的注意，加之普希金这时正在阅读有关18世纪的历史资料，他感到多年来一直想围绕普加乔

夫时代创作一部小说的想法可以实现了。

1831年普希金结婚了。结婚的巨大花费，孩子的接连出生，妻子的大量花销，令年俸只有5000卢布的普希金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四处借钱、筹钱、贷款几乎成了普希金婚后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普希金更加勤奋地工作，尽力不放过任何一个靠自己的写作可以赚钱的机会。1831年普希金开始了《彼得大帝正史》的写作准备，他每天“钻进档案馆去”查找资料，在做这项工作的同时他发现了关于普加乔夫的资料。普希金后来说：“我曾经打算写一部关于普加乔夫时代的历史长篇小说，但是由于发现大量材料，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便写了一本普加乔夫暴动史” [3] (457页)。由此缘起，就有了普希金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历史著作。该书的出版使普希金得到了2万卢布的稿酬。

二

《普加乔夫暴动始末》于1834年底出版。为了写作该书，普希金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当时所能找到的一切与普加乔夫相关的书籍和文章，还亲自到起义的发生地进行了考察，访问了尚健在的起义目击者。该书出版送审期间，尼古拉一世提出不能为骗子撰写历史，改书名为《普加乔夫暴乱史》。苏联时期恢复原名。

《普加乔夫暴动始末》全书共八章，我的中文译本包括《关于暴乱的评注》、《附录》等内容，共约17万字。纵观全书，普希金以简练的文笔非常客观地讲述了普加乔夫起义从发生到结束的整个过程，描述了起义军攻打要塞、夺取城镇及政府军围剿起义军的战斗场面。该书虽然只是对事件的叙述而没有专章对起义进行评价，但从字里行间和不多的评论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普希金对普加乔夫起义的态度。

首先，普希金非常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反对普加乔夫起义。普希金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角度，从主张改良，反对暴力的观点出发，反对这场起义。他认为起义是一场“可怕的动乱” [5] (42页)，造成了无数人的流血和死亡，“状况惨不忍睹”，起义使城市和乡村变为一片废墟，许多地方“都已无人管理，百姓不知道该听谁的” [5] (84-85页)，起义使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吉尔吉斯-凯萨克人趁混乱“穿越未设防的边界”，到俄国打家劫舍；土耳其“挑唆”俄国边境各民族起来骚乱；“某些欧洲大国也想对俄国当时所处的困难处境加以利用” [5] (42页)，因此普希金主张对起义进行坚决的、严厉的镇压。

其次，普希金虽然反对普加乔夫起义，但不是单纯地站在贵族的立场上谴责这场起义，他关注起义何以会发生，又何以会演变成为波及俄国东南60万平方公里、成为有各民族民众参加的人民大起义的问题。普希金对起义的发生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认为起义的爆发与沙皇政府官员们的压迫有密切关系。普希金指出，雅依克哥萨克原本过着他们固有的自由平等的生活，归顺俄国后他们“顺从地”按照莫斯科的规定服兵役，但是政府在军队中设立的办公厅的官员们对他们施行各种压制，哥萨克不甘遭受压迫，起来抗争，先是向上级、甚至向女皇控告，在长达十多年的抗争中，雅依克哥萨克也多次进行过起义，结果是不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遭到报复、镇压和迫害，被发配到遥远的地方去服兵役 [5] (5-6页)。在这种情况下，雅依克哥萨克决心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非好好治一治莫斯科不可” [5] (8页)。普希金指出哥萨克的控告是“公正合理的”，是官员们“不能够或者不想使他们满意” [5] (6页)。

对于起义迅速发展，规模迅速扩大的原因，普希金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民众中存在着“普遍的愤怒情绪” [5] (48页)，“所有的平民百姓都拥护普加乔夫” [5] (158页)，众多的哥萨克、老爷们的农民、工厂的农奴、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等都投奔普加乔夫；另一方面是由于“官长们不可原谅的玩忽职守” [5] (93页)。普希金认为民众的不满是由于官员们的压迫引起的，而官员们玩忽职守，未能及时制止起义的蔓延，是由于他们有的人贪生怕死，放弃职责，有的畏首畏尾，优柔寡断，有的推诿扯皮不服从命令。总之，普希

金认为在起义的爆发和迅速蔓延这个问题上，沙皇政府的官员们负有重要的责任。

第三，普希金对普加乔夫起义军，对普加乔夫本人的评价，采取的是两分法。普希金既认为普加乔夫起义军是由哥萨克、起来造反的农民、逃跑出来的苦役犯、各种各样的流浪者、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等这样一些杂七杂八的人组成的乌合之众[5]（26页），同时也认为普加乔夫起义军充满了生命力，指出它虽然一次次地被击溃、被打散，但它又一次次地强大起来；普希金既认为起义军是到处杀人放火、行凶作恶的盗匪，是愚昧无知的人们；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起义军所到之处只杀贵族和当官的，只“抢劫官府的钱物和贵族的财产，但是他们却不动农民的财物”[5]（27页）。

对于普加乔夫本人，普希金给予了更多的肯定，甚至可以说还有几分赞赏。普希金认为普加乔夫具有善良的本性，他“下令禁止砍杀百姓”[5]（162页），“严厉禁止”鞭打俘虏，虐待妇女、儿童[5]（71页），当被俘士兵为其仁慈的长官向他求情，他甚至能够改变主意，免其一死[5]（37页）；他指出普加乔夫具有勇敢的精神，打起仗来身先士卒，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军事知识[5]（52页）。普希金欣赏普加乔夫面对死亡的无畏气概，指出普加乔夫坐在押运的囚车里，“心情平静”，“一直很快活”；回答政府官员的审问时，从容不迫，戏谑有加，即使被用铁链锁在墙上无法施展威力的情况下，“依然让人望而生畏”，其“如炬的目光和威严的声音”甚至吓昏了许多前来观看的妇女。普希金还指出，在断头台上普加乔夫频频向围观的人们鞠躬，并说如果他“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请求他们原谅[5]（89-92页）。普希金把普加乔夫和起义军的某些残暴行为区分开来，认为“普加乔夫并不能大权独揽”，有些事情“首倡作乱的雅依克哥萨克”事前并未“征得他的同意，有时甚至违背他的意愿”[5]（27页）。有理由认为，普希金最看重的恐怕还是普加乔夫反抗专制压迫，反对农奴制奴役，追求自由的精神，因为这也是普希金的一贯追求。如果考虑到普希金写作该书时，当时所有的书籍、文件都把普加乔夫称之为“贼”，“野兽”，“欺骗者”，“残忍者”，把普加乔夫说成是“一个脱出自然法则生成的恶魔”，“本性之中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善，没有一丝一毫使有理性的人有别于无理性的动物的那种善良因素和精神”[5]（181页）的情况，应该说普希金给予了普加乔夫以相当多的肯定评价。

三

研究了普加乔夫起义，普希金对贵族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有了明确的认识，即18世纪后期贵族和人民的利益已经是彻底相对立的。普希金在带有总结性质的文章《关于暴乱的评注》中指出，在起义中，贵族完全和政府站在一起，而所有的平民百姓都拥护普加乔夫。普希金也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对新贵族是缺少世袭贵族所具有的那种自尊、独立、勇敢等高贵品质的看法，普希金指出，有“好多”非世袭贵族出身的军官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投降变节“参加了普加乔夫团伙”，而世袭贵族——“真正的贵族”中只有什万维奇一个这样做了。普希金进一步指出，祸福倚伏，叶卡捷琳娜政府本应进行“多项”改革，但实际上实质性的改革几乎没有进行。

《普加乔夫暴动始末》真实地记录了普加乔夫起义和起义发生的那个时代，为后人研究18世纪的俄国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普希金也因他对普加乔夫起义及彼得大帝时期的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被苏联科学院认为，是俄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

注释：

①苏联史学家布洛克指出，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俄国社会所有的进步分子都热烈响应这个革命及随之而起的比利时等国的革命高潮，而贵族地主都以恐惧的心情谈论俄国出现“第二

个普加乔夫事件”的可能性。就在这种特别紧张的政治环境里，普希金的《普加乔夫暴动始末》问世了。见：《文史哲》1951年第1卷第3期，第25页。

②特罗亚指出，当普希金为了写《彼得大帝正史》在皇家档案馆查阅18世纪的资料时，普加乔夫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有意无意地开始留意起普加乔夫来。见：《普希金传》亨利·特罗亚著，张继双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562页。

[1]李玉君，女，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邮编730000。

参考文献

- [1] [俄]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C].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2] [苏]《A·H·伏里夫日记》，第137页，转引自《普希金论文学》，[M]. 张铁夫、黄弗同译，漓江出版社1983年。
- [3] [苏]列·格罗斯曼：《普希金传》，王士燮译，[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 [4]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595页，转引自《普希金论文学》，[M]，张铁夫黄弗同译，漓江出版社1983年。
- [5] [俄]普希金：《普加乔夫暴动始末》，李玉君译，[M].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
- [6] 《普希金诗选》 卢永编选，[M].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 [7] [法] 亨利·特罗亚：《普希金传》，张继双等译，[M].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 [8] [苏]尤里·洛特曼：《关于1826年9月8日普希金与尼古拉一世谈话问题的几点补充意见》，转引自刘文飞：《阅读普希金》，[M].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新闻录入员：shiyajun（共计 47 篇）

- 上一条：[乌克兰危机的人文透视（12-25）](#)
- 下一条：[试析俄美分歧及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可能性（12-25）](#)

相关专题：无

相关信息：普希金与历史研究

尚无信息

尚无信息

